

论当代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主题的流变

雷 鸣^{*}

〔摘 要〕 边疆对汉族作家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时代历史语境之不同,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寄寓着不同主题内涵。在1950—60年代的边疆叙事中,多写边疆的革命化历史与现实美景及光明未来,隐含的是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新时期之初的边疆人性温情故事,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边疆叙事主题,则是寻求边疆文化的异质活力以改造国民性和精神救赎。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主题不断变迁,表明汉族现代知识分子对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态度,亦透递出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与暧昧。

〔关键词〕 汉族作家;边疆叙事;民族国家;国民性;精神原乡

在当代文学中,有如此令人瞩目的现象:创作主体是生活在内地主流文化区域内的汉族作家,由于当时社会时代情势或个人兴趣爱好所致,他们或者长期生活于边疆地带,或者短暂偶涉边疆,边疆于他们来说,具有“异域文化”的特质,他们将笔墨倾注边疆区域,突出表现迥异于内地主流文化的少数民族风情和生活体验。神秘而遥远的边疆地带(如西北边疆之新疆、西南边疆之西藏、云南,东北边疆之大兴安岭)成为了众多作家创作的表现空间。如1950—60年代,周非之于新疆,彭荆风之于云南;1980年代,王蒙的新疆系列小说、郑万隆的东北边疆小说;1990年代,红柯的新疆系列小说;新世纪以来范稳、杨志军等人蔚然成观的“西藏叙事”小说等。在不同的语境下,作家的边疆叙事写作寄寓着不同主题内涵。通过对其叙事主题的考察,我们能清晰地探索到汉族现代知识分子对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复杂态度。在此基础上,我们亦能够尝试对中国人独特的现代性经验的打量,深度触摸到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与暧昧。

一、革命之化:民族国家想象的需求与可能

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民族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生活在国土内部的所有人及其群体

^{*} 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071002。本文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研究”(12YJC751030)中期成果。

对共和国的认同或忠诚。边疆地区远离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的腹心区域,又多为少数民族聚居。这些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下各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没有内地主要民族的强烈。基于边疆地区特殊的现实状况,动员他们对共和国的认同和忠诚,毫无疑问显得急迫,亦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更需要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功能,以团结教育边地各少数民族。

安德森曾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①。也就是说在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中,互不相识的人之所以能有一种一体感和连带感,正是因为他们想象彼此拥有共同的过去记忆。因此,认同新生的民族国家必须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其道义的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完全由革命所赋予。这一点经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载体的反复想象和建构,已然在广大内地民众之间达成了一种普遍的精神共契。

相比较而言,边疆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特殊状况,加之在边疆除阶级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民族之间的矛盾,革命意识形态的传播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远不及中原内地。为了让边疆与内地在民族国家共同体认同上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作为基础的文化想象,叙述边疆各少数民族与内地汉族共同分享的历史,便成了50—60年代小说中汉族作家边疆叙事不约而同的选择。

为了撰写这一共同的历史,“边疆叙事”小说通常以共产党领导革命这一意识形态的罗盘对边疆进行重新诠释,对边疆非革命的异质多元的要素进行整合、改写,以实现与内地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殊途同归”,即“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则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②。为此,它们常见的叙述策略,便是强调边疆与内地有着

共同的苦难与命运,突出“苦难与解放”的记忆共识,通常叙述边疆少数民族的贫苦大众与内地汉族劳动人民一样遭受着剥削阶级的压迫和苦难,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反动阶级,才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贫苦大众赢得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如周非写新疆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多浪河边》,维吾尔族农民哈德尔受尽克拉木巴依的残酷剥削压迫,总是想改变命运而不得,后在监狱里遇到了共产党员阿不力孜,走向了推翻走向推翻反动阶级的战场。彭荆风写云南边疆的短篇小说《当芦笙响起的时候》,讲述了拉祜族小伙子扎妥遭受国民党残余部队的迫害,与自己心爱的人娜兰被迫分离,逃进了原始山老林里成了“野人”,后来在共产党、解放军的帮助下,与娜兰团聚。王玉胡写新疆的《阿合买提和帕格牙》,帕格牙被迫嫁给了青河县有名的大“巴依”,宁死不从遭到了地主的毒打和囚禁。后来在阿合买提帮助下,他们出逃,躲进深山,过起了原始人的生活。直到新疆解放,夫妇俩才重获新生活。刘克的《古堡上的烽烟》中的藏族女奴隶苍姆深受奴隶主的迫害和凌辱,后来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她成了农场工人,并成了帮助解放军消灭叛匪的英雄。不难发现,这种叙事模式几乎是内地革命样板故事《白毛女》的翻版或稍加变形,无不或显或隐地指向“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体现内地阶级特色和时代主题,这种与内地革命历史小说亦步亦趋的叙述策略,正是建构基于共同体历史记忆的“通识”,以此揭示边疆少数民族与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一致性,从而确立整个国家历史记忆的“一体化”。

当一个胜利的民族国家,通过建构共同的革命历史记忆完成合法性论证之后,迫切需要完成的另一项任务便是寻求所有公民对国家的归属与认同感。要促使民族国家共同体在边疆地区获得广泛的深入的认同,必须向边疆民众传递对现实良好的主观评价及对未来的期待。

①[爱尔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②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页。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边疆由于历史状况、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相较于内地更显贫穷与落后,有不少少数民族直接从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被国家行政权力强行整合进入了新生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中,于是传递对“共同体”的现实评价和未来期待,显得尤为迫切。

为了向边疆民众传递对“共同体”的现实良好评价和未来期待,国家不仅要在实践中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促使边疆与汉族内地达成一种比较均衡的秩序,同时也需要通过文艺作品,在想象中建构边疆的美好现实与未来,不断为边疆民众描绘一个合理的远景,以便迅速更广泛地在边疆的群众中确立幸福、明朗的新中国形象,增加对新生的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信心。正如安德森所说:“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而这就是现代民族的正字商标。”^①基于此,广大作家激情荡漾地展示边疆新貌和新生活的蓝图,光明现实和美好未来的边疆形象在边疆叙事中得以模塑成型,使得边疆与内地、国家的命运和目标具有了通约性与呼应性。

首先,许多作品展现“边疆生活无限春光”。从今昔对比和感恩的角度,在各个层面上展示了时代变革给予边疆的光明现实。这些作品多通过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先进、旧时代与新时代、苦难与幸福、压迫与解放等二元话语,构成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着眼于对伟大历史转变的讴歌和民族大团结的咏唱,凸显出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边疆现实的美好与幸福。曾以《南行记》书写西南边疆的现代作家艾芜,其《南行记续篇》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袭用“忆苦思甜”情节结构模式。一写到新社会,总是“阳光晴朗”,“显得无边的光明”,一写到旧社会就是“苦海无边”。恰如作者在《序言》中表明的,旨在通过“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对比”,展现新中国“把地狱换成人间的伟大变化”。彭荆风的《卡佤部落的火把》讲述了位于西南边疆的卡佤部

落,一个昔日满目疮痍、疾病蔓延、民不聊生的瘴疠之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次是表现“工业文明照边疆”如火如荼的画面。一些边疆小说关注和描绘工业文明对边疆的介入和改造,表现工业文明唤醒了沉睡与落后的边疆,给边疆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引导边疆民众想象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光明的现实和未来前景。最典型的文本,是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小说叙写一群来自内地的汉族干部和技术人员,来到尚处于封建农奴制的西藏高原,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修建水坝电站,并建设农场,给西藏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揭示西藏同伟大祖国一同前进的步伐。黄天明的《边疆晓歌》则描写了一批知青来到孔雀坝,从昆明带来了拖拉机和农具,要把孔雀坝建成以咖啡、香料为主的长期作物基地。

总之,无论是对边疆历史的革命化书写,还是通过今昔对比表现边疆生活,突出以工业文明为主调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唤醒沉睡的边疆。50—60年代小说中边疆叙事,承担的是重构所有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并使之成为所有的成员普遍认同;同时为国民预设未来的远景,使国民对新中国充满美好的期待和憧憬,对民族国家“共同体”产生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信心。按照安德森“想象共同体”的理论,边疆民众能在“小说”这种传播媒介中持续地确信这种记忆与期许,这种共同的记忆与期许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边疆地民众亦持续地确信“民族国家共同体”就植根于自己的现实日常生活之中,从而对这一“共同体”有着不寻常的认同和归属。因此,此时的“边疆叙事”,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建构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二、明亮的“飞地”： 寻求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人性温情

新时期之初是一个复杂而庞杂的社会语

^①[爱尔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32页。

境,无论伤痕小说的泪海、滔滔的社会控诉,还是反思文学面对历史血污的追问与反省,它们决不是仅仅记忆和思考那畸变的历史与个人的命运。“‘文化大革’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一种以极左为表征的社会文化实践的破产和一种全新的现代性社会文化设计的启动”^①。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正是新时期之初广大民众极为重要的精神关切,面对心灵的废墟与价值崩塌的现实,人们急切呼唤的是被破坏后的价值理想得以重建。在经历了一场非人、反人的历史浩劫之后,在经历了死亡与戕害人类的魔舞之后,对人的重新发现与重建人的尊严与价值,自然成了价值理想重建的“头号工程”。因此,人们在深深地体味一种巨大创伤存在的同时,无不渴望人间温情的重返,以此汰除历史血污,进而摆脱屈辱与兽性的记忆重负,从恶梦般的惊悸中走出,重新扬起中国现代性工程之帆。

众所周知,凝聚着美好人性的普通劳动人民,曾给许多落难作家以力量与生命。把普通民众的温情、善良、正直、勇敢等品质表现出来,努力发掘着潜藏于民间生活可能具有的人性品格,以此作为更新自我和社会的精神力量,从而重建和恢复十年浩劫中被完全破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作家们弥合创伤,祈祷与吁请美好未来的“良方”。此时,有着边疆生活经历的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凝眸于曾经在浩劫岁月与自己生命厮守的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通过拾取散落于边疆僻乡的充满爱、朴素和真生命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呈现边疆之人所秉持着的良善道德与美好人性,展示着远离内地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疆”民间那最自由、最温暖、最纯朴的人性一角。

王蒙的新疆题材小说《在伊犁》系列极为典型。如《虚掩的土屋小院》、《哦,穆罕默德·阿麦德》、《爱弥拉姑娘的爱情》等,叙述了汉族落难者“我”或叫老王,来到伊犁的巴彦岱,与维吾尔人的交往经历,展示了新疆普通农民许多难

能可贵的性格品质,他们善良多情重义,宽厚仁慈,对身处逆境的外来者“我”给予深切的关心和温暖。鲍昌的《盲流》中的主人公史岱年是“四人帮”暴政下的“逃犯”,他流浪过大半个新疆,不断得到过好人的帮助,尕豆妹、沙拉木汗都先后爱上了他,曲木三、洪那比亚等也都以各自的善良与真诚喜爱着他。边疆小人物秉持着的良善道德与美好人性,给这个流放者的苦难生活带来着人间温暖。范向东的《高原深处的人们》叙述了在特定年代,知识青年张青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藏东北地区。在他痛苦犹豫被矛盾困扰时,许多人给以鼓励、爱护和帮助,藏族的牧羊姑娘扎西卓玛更给以炽热的爱和帮助,即便是后来张青被关进监狱,卓玛对张青的感情始终如一,没有像在内地那个年月经常发生的反目成仇、划清界限的事情。

这些边疆温情故事,之所以叠现于新时期之初,一方面是真实复现了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同时另一方面承担着为“新时期”国家现代性的政治实践进行社会动员的功能。因为在“文革”中,许多普通的人曾对落难者和受伤者进行过帮助,这表明在文革结束之前,劳动人民就有了先期的历史洞见与自发的道德直觉。如有人所说“呵,人民呵,人民!当你们自己忍受着十年浩劫给你们带来的饥寒、家破人亡的苦难的时刻,你们还想着为革命保护一些‘五七囚徒’,一些‘狗崽子知青’,千方百计地要给予他们一些生活的温暖和光明……”^②人民用实际行动早已对历史做出了和新时期国家的社会政治实践一致的判决,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昨非而今是,这就使现行的国家社会政治实践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其未来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于是建构感人的普通人的温情形象,尤其是突出表现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化外之地”的边疆凡人温情,能更有说服力表明了其“化外”的边疆民众有先在的历史洞见,更有力地维持了社会的全体成员正义不堕的神话,起到了强化民众的

^①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潮》(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②柯岩:《诗人的眼睛——给〈巴山夜雨〉的作者》,《文艺报》1981年第1期。

团结之效,也宣喻着国家现代性重新出发是有着坚实的民间基础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三、边缘活力:改造国民性的异质补丁

“改造国民性”是自晚清以来始终萦绕着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清末开始,许多仁人志士都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和真诚的实践。这一思潮不但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界、思想界,直到当代仍能听到其响亮的回音。

回顾历史,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一般有以下两种基本路径:一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显示一种本位文化的批判姿态,亦即以西方为标杆,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自身进行一种镜像化认知,在检讨与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注重主张国家民族意识和个人本位意识的塑造。如严复首先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学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致力于思想启蒙与文化变革的先驱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继承了在晚清启蒙主义思潮中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为武器,呼唤“人”的现代化。二是弘扬汉儒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之独特价值,去治疗国民劣根性的沉痾。这种路向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先是以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号召“以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五四前后的杜亚泉、钱智修、梁漱溟、张君勱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吴宓、梅光迪代表的“学衡派”都注重揭露和批判西方文化之种种弊端,以此证明学习

西方文化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在民族复兴的抗战时期,张君勱、熊十力、钱穆、梁漱溟、冯友兰等人作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派,这种路向总体特征是宣扬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契合于时代的元气、灵魂与生命。这一固守民族血脉,内化西方文化来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可用促“老树发新芽”来概括。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开放与变革的日渐深入,现代化的鼓点深刻地撞击着中华民族固有的生活秩序和传统习惯。面对绚丽彩虹似的欧风美雨,人们普遍有一种深重的迟滞感和失落感,在茫然失措与瞠目结舌的同时,迫切需要重新认识民族力量,重新挖掘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内涵,以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从而抵挡狂扫一切的外来文化,确立建设现代化的支撑点。而在一些作家看来,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内涵却存在于规范外的文化,如韩少功所说:“象楚辞的风采,现在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象旧时极典雅的‘咸服’和极通行的‘净办’(安静意)等古语词”虽都属于“不规范”文化之列,但却都“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①与此相同,李杭育也说:“与汉民族这个规范比较,我国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富于浪漫的想象,从经济形态到风俗、心理,整个文化的背景跟大自然高度和谐,那么纯净而又斑斓,直接地、浑然地反映出他们的生存方式和精神信仰,是一种真实的文化,质朴的文化,生气勃勃的文化,比起我们的远离生存和信仰、肉体 and 灵魂的汉民族文化,那一味奢侈、矫饰、处处长起肿瘤、赘疣,动辄僵化、衰落的过分文化的文化,真不知美丽多少!”^②

于是,一些作家注目与关切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文化区域,把边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之“源”来认同,努力挖掘其中的正面意义,从而获得改造“国民性”可以汲取的文

^①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②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化资源。这些作家对边缘文化的关注,正是要以边疆的个体、自由、生命的价值原则和蕴藏于边疆民间文化中的生命活力,来“夹击”、“救治”业已偏枯、颓废了的现实中国人的精神。

1980年代的郑万隆关注着东北边疆茫茫的林海与辽阔的雪原所铸造的强悍雄劲的品性。《异乡异闻》系列小说着重描绘生活在森林里的人们郁勃的生命活力,粗砺坦荡的感情及延续生命的方式,他们桀骜不驯,孔武有力、勇敢正义,跃动着刚健不息、雄劲无边的生命蛮力。《老棒子酒馆》显现出来的蛮野粗犷的雄劲之风,的确摇动心旌。流浪汉陈三脚,擒拿野兽,从不凭借武器。类似《陶罐》、《狗头金》中的人物赵劳子和王结实的身上,他们粗野,甚至残忍、霸道。1990年代,曾居留新疆10年的红柯,则试图以新疆的“异质”注入我们文化的努力,他曾如此说:“我们这个民族近代以后几乎是退化了。我想把那种血性的东西又恢复起来……新疆有中原文化没有的刚烈,有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文化漠视的东西。”^①对刚烈、强悍“血性”的热切呼唤之情,在他的《西去的骑手》中得到了倾心表达。小说以极为粗砺的叙事笔调,成功地塑造了马仲英这位旷世英雄的血性男儿形象,这位充满血性的骑手没有软弱、没有卑怯与苟安,更没有悲情的眼泪,惟有淋漓尽致的挥洒野性的刺杀战斗,狂喊咆哮、长啸九霄,横行天下。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新疆故事”,塑造着强悍、雄阔、粗犷与豪迈的新疆血性男儿形象,如《复活的玛纳斯》中的团长,《乌尔禾》中的海力布、《莫合烟》中的老王、《吹牛》中的马杰龙,都是新疆荒原滋育的血性男儿。在新世纪里,在内蒙古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之久的学者姜戎,把目光投向了边疆的蒙古草原,在《狼图腾》中写出了蒙古草原狼性的强悍锻造出了游牧民族性格的雄强,思考着汉民族的缺陷,诚如他所言“越是真实深刻地了解狼的精神,我就越是感到汉民族性格缺陷的严重性。我只是在中原大

地的农耕土壤上,树立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参照系,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本民族的弱点。”^②

杨义曾提出了文化与文学的“边缘活力说”,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存在着“中原文化”(汉族传统)与“边缘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两个系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精神思维上的原始性、原创性、多样性和丰富的想象性特征,其丰富性能够补足中原文化的缺项。“当中心文化发生僵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形质特异的、创造力充溢的边缘文化或民间文化崛起,……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奇迹般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核心的凝聚作用之外,尚存在着生机蓬勃的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③上述几位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正是意识到边缘文化活力,从边缘文化寻找资源,讲述边疆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重塑国民性,从而形成了改造国民性的第三条路径——吸收边疆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与活力,以救赎孱弱的国民灵魂,重铸国民性。

四、最后的据点:失落之后的精神原乡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持续突进,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图景由充满期待到拥有。但在物质生活丰饶的同时,也伴随着人性堕落、道德恶化;世俗众生在无限物欲的追逐中,遗落了信仰与激情。面对时代新变,“礼失而求诸野”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似乎又一次惯性地作用于当代作家身上,他们纷纷地把创作视野投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远离繁华、喧哗的边远地带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原乡。“边疆”如同一个可以抵抗外力入侵的据点,一枚指向心灵救赎的路标,一个升华精

^①叶开,钟红鸣:《访谈录》,参见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

^②舒晋瑜:《唤醒强悍——访《狼图腾》作者姜戎》,《中国国土资源报》,2004年10月25日。

^③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3-94页。

神的绿洲,一种获得庇护和安然的迷人港湾,这其中尤以“西藏叙事”最为突出。

我们知道,西藏遗存着完整的信仰体系,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地域风景,那充满原始气息的未被现代文明侵染的风俗习惯,尤其浓烈的宗教文化氛围,都迥异于繁华骚动的中国中部和东部。宗教信仰意识强有力地渗透于斯,人们对信仰的虔诚坚定,对精神的矢志守护,好似现代人信仰体系崩塌之后的唯一救星,是世俗纷纭间最后一片净土与理想王国。相比之下,生活在中心地带的内地人搏杀于甚嚣尘上的欲望之中,精神无着落,而遥远的西藏似乎提供了一块可借以逃避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缓解压力的心灵绿洲。正如有论者曾对西藏作如此感悟:“神秘、纯洁、博大、涵藏着生命终极意义的性灵之地,是与物质、欲望相对的世外桃源,从而,赋予她一种救赎功能,救赎在现代生活中迷失了的灵魂。”^①

于是,敏感的作家们在“西藏”开始各自的精神原乡之旅,他们把有关西藏的深刻印象或深切体验注入文本之中,成为切入审思发达中心地带生活的一个主要坐标;或成为看取当下人生与社会的一个对比参照。“西藏”在作家的笔下,不只是原生态的自然胜景之所在,更是输出精神资源的富矿,是映照国人缺失感的一个场域,是吸引各种缺失的心灵停泊的锚地。

云南汉族作家范稳把目光锁定在滇藏交界的边缘藏东大峡谷,他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和《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充溢着对宗教信仰的喜爱与崇敬,“表现出来的是藏民对宗教的虔诚,那种精神性存在的超越现实的无穷力量,那种信仰的无限崇高性,都表现得极为充分,在这样的时代也不失有震撼人心的意义”^②。马丽华《如意高地》则讲述了西藏历史深处的一个冰清玉洁的爱情绝唱,叙述了清末民初的军队统领陈渠珍一生与一位西藏女性的爱情故事。无论陈渠珍面临任何难关和遭遇危难,西

原都会无怨无悔无私地现身排忧解难,对丈夫信奉“一生三世,我都会陪你”的挚情心念。当我们现代人把爱情附丽于对宝马香车、金钱财富的追逐时,这样的爱情似乎是遥远的神话,而惟有藏地才能产生这样弥足珍贵的爱情童话。党益民的《一路格桑花》中的驻藏官兵那格桑花般绚丽而寂寞的人生,冰雪澄澈的内心世界,感动着都市来的女白领,这里对她们来说,具有涅槃与再生意味。安妮宝贝的《莲花》中的西藏墨脱被建构成了走向光亮的圣地,闪烁着彼岸的光辉,三个受到伤害的内地人在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感悟。宁肯的《天·藏》中的西藏,成了脱离一切世俗世界轨道的终极之地。杨志军的《藏獒》三部曲则借雪域高原藏獒的忠诚与勇敢,拷问着当下现实社会中人性的缺失。

麦克卢汉曾深刻地论述美国西部片中的边疆生活,为何令美国人着迷:“机械化常规把我们搞得污秽满身,经济和家庭的复杂变革把我们搞得稀里糊涂,这个幻想中的西部给我们提供了骑士的冲劲,提供了生机勃勃、没有顾忌的个人主义。昔日的敌人是狡诈的封建贵族;新兴的敌人是聪明而独立的机器。对于被宏大的工业搞得晕头转向的人而言,幻想中的西部恢复了人性的尺度。”^③从麦氏论述中,可以明白一点,美国的西部边疆,为当时处于工业社会的美国人提供了一种深深的怀旧情绪,一种精神补偿意义上的心理治疗。与此类似,如同当时处于工业社会的美国人对西部边疆的向往一样,此时的“西藏”边疆,恰如上述与内地不同的特点,正好为在汉族都市中人群提供一种“恢复人性的尺度”的心理治疗,成为一种心灵舒缓净化的有效孔道。

结语

分析至此,上述的几种主题的流程,其实都

^①费勇:《零度出走》,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②陈晓明:《2006年度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10月推荐榜》,《山花》2006年第9期。

^③[加]马歇尔·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2页。

包含了汉族作家如何借助处于边缘位置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代性进行的思辨。质言之,50—60年代的边疆叙事的主题是寄寓了新生民族国家对现代性全面铺开的急切;新时期之初的书写边疆温情,渴望从文革灾难的记忆重负中走出,则是表明国家的现代性工程遭遇挫折后,要求现代性重新出发的一种信心与民意。“改造国民性的异质补丁”与“失落之后的精神原乡”,则都是在面对现代性的挤压和逼迫时,汉族作家向边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寻求的一种自救方案,以达到精神救赎与缓解民族文化身份焦虑目的。不难看出,前两种主题与后两种主题,恰好构成相悖的两极,一极是对现代性的迎应与追赶,一极是对现代性的抵抗与反思。这正生动体现了中国

现代性之暧昧,现代性在当代中国的命运是如此复杂的局面。正如有论者所言:“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还很不充分,中国的后现代性也不是继现代性充分发展之后浮出水面的,而是扮演‘早产儿’的角色与现代性同时并存。加上全球化浪潮日猛,西风东渐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的黑手悄悄地伸入了中国现代性的衣襟之中,中国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并存的局面。”^①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之现代性的特点——时而对现代性正面迎接,时而对现代性的拒斥,对现代性的态度总是处于双重摇摆之中。

(责任编辑:陆 林)

Evolution of the Themes of Han Nationality Writers' “Frontier Narratives”

LEI Ming

Abstract: Since the frontier and its culture are exotic to them, writers of Han nationality manag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majority Han cul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ose writers have different themes when making their “frontier narratives”.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y tried to describe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happy reality and bright future of the frontier areas, the rationale behind which i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olidating the image of a nation stat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1970s to the mid-1980s, they tried to delineate the nice and helpful nature of frontier people,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personal memories bu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state to rallying a wide range social support for its modernization drive as well. Since the 1980s, the theme of their frontier narratives, however, is shifted to seeking for the intrinsic heterogeneous vigor included in the frontier culture, which is thought to be able to help reform and strengthen our national character. The evolution of the theme of Han nationality writers' frontier narratives speaks of their complex attitude toward the frontier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s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s a complex and equivocal picture of Chinese modernity.

Key words: Han nationality writer; frontier narrative; nation state; national character; spiritual self

①王建民:《现代性在中国:建构与反思》,《光明日报》,2006年9月26日。